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六七四八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刊創刊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第五卷二十二期

(總號第一二六期)

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廿五日出版

新力

社論

我對越南應採自衛準備

蔣總裁：新聞界共通守則

如何發揮訓練效能

印度·甘地·尼赫魯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CHINA

萬湜思

李立民

雁
翎

南京圖書館藏
每份六分
社址

社論

我對越南應採自衛準備

雁翎

按首相近衛第二次登台，負着倭軍民重大的期望，但是內政外交，仍毫無辦法，在現金枯竭，原料缺乏，動力減少之狀況之下，生產率祇有降低。又因為美國禁止油類發輸日，軍艦與飛機的燃料雖然不致於立刻斷絕，而軍械的製作馬上發生困難，物價增高，物資缺乏，使一百〇六萬萬的龐大預算無法實行，祇有拼命發行紙幣與公債。這種紙幣通貨膨脹，必定造成經濟界大混亂，離崩潰之期不遠了。至於政治，近衛一直主張國民組織以及所謂政治新體制的。政友會與民政黨相繼解散，似乎近衛的一黨制可以實現了。不過我們考察政黨發生的經過，一定要有多數黨員，有領袖，有奮鬥的歷史，然後這個黨才能站立得住。近衛的官辦政黨，雜糅各派，就是能够成立，也是四不像，如何能够樹立政治新體制？近衛的外交政策，想與英美蘇調處，成就很少；想親近德蘇，德蘇不辦於島伍。第一次歐戰是日本發展國力的大好機會，第二次歐戰爆發，日本再討不到多少便宜了。蘇聯與美國是日本想像中的敵國，現在美蘇國力一天一天向上，尤其是近來美國軍備突飛猛進，比較起來，日本不但不是一等國，連二等國都做不到。

日本之所以內外交困，自然是因為侵略中國的原故。日本國政為一班驕縱的軍人所操縱，沒有大魄力的政治家引導着全國自迷途而知返。反而將錯就錯，疊疊到底。這幾個月來，倭軍偷竊德軍的閃電戰術，它的計劃，第一是轟炸行都，想動搖我政治中樞；第二是乘機急進，想深入內地；第三是封鎖沿海，想斷我物資的接濟。結果又白費了心力，因為第一，重慶防空設備週到，敵機幾次的轟炸，雖被破壞我若干教育機關，殘殺了若干良善平民，然而軍政機關未受到損失。第二，敵軍雖佔宜昌與龍州，已再無法深進。距離所謂板垣停戰線還遠。第三，封鎖沿海，並不能斷絕我物資的輸入。敵人在窮極無聊之際，於是目光轉到越南。

越南現在是法國的殖民地，而法國是新的國家，日本認為是可以欺負的。它想佔領越南，西可以向暹羅緬甸發展，南可以威脅新加坡，東可以隔斷香港與歐洲的聯絡。又可以奪取安南的米、煤、樹膠等項出產，以補充它的軍需與民食。最重要的作用是將將在南寧、龍州的倭軍聯成一片。由此窺伺雲南。對於敵人這種企圖，我們一定要予以堅強的打擊。

越南原是我國的藩屬，前清光緒年間才被法國佔去，現今越南有華僑四十萬人，在上商業上佔重要地位。抗戰以來，與廣西、雲南兩省的交通尤為密切，這樣一個地方，我們當然不能讓敵人拿去當作據點來攻擊我國。我國為自衛起見，應該有個準備。我外交部士部長已於六月廿四日發表宣言，末段云：「中國政府確信日本在亞洲或太平洋上任何區域如有軍事侵略行為，無論其出以何種方式，無非藉其侵略所得完成其征服中國之根本目的。尤屬甚者，日本如侵佔越南，在亞洲或太平洋上任何區域如有軍事侵略行為，無論其出以何種方式，無非藉其侵略所得完成其征服中國之根本目的。持其生存獨立與遂行其不計之反侵略主義，自不能不因日本之逼迫，而採取取越南以攻擊。故日本如知在越南等地有武力侵犯行為，中國政府為維持其生存獨立與遂行其不計之反侵略主義，自不能不表示決然的態度。日本所謂所謂運輸委員會既早已入駐海防、河內等地，復向越南要求種種軍事權利。倭海軍集中於東京灣，陸軍三師團集中於海防島，有在海防登陸的傳說。這是我國實行自衛權的時候了。王外長於八月廿八日發表宣言云：

「中國於抵抗日本侵略中，如日軍不利用外國領土攻擊中國時，原無派遣軍隊進入外國之慮。故現在越南邊境附近駐紮之中國軍隊，初日軍一日不入境，當一日留駐中國領土，而不令其開越國境內。現得確實消息，日本必欲派軍在越南登陸，並在越南境內採取其他軍事行動，藉以攻擊中國領土。中國政府對此特鄭重聲明：日本武裝隊伍果進入越南時，不論其用何種口實，並不論其在何種情形之下，中國政府將認為此舉係對中國領土安全之直接與急迫的威脅，當立即向該派武裝隊伍進入越南，俾得採取自衛措施，以應付因此種局勢。所有因採取此種必要措施而發生之結果，中國政府自不負任何責任。而法國當局如在越南准許或容忍日方任何軍事行動，則所有因此是發生之結果，包括越南中國僑民所受身體及財產上之一切損失，法國政府自不能辭其責任。」

王外長這個宣言，是光明正大而且出於自衛與保衛的必要，全國國民應該一致擁護，以求貫徹。

總裁：新聞界共通守則

中政校新聞專修班首期畢業禮訓詞

要點：一、善盡普及宣傳之責任 以革路匪徒之精神，

向內地散播文化種子，提高人民智識。

二、善盡宣揚國策之責任 以促進我國民族獨立自

尊心，養成我國民族奮鬥向上心為旨歸。

三、善盡推進建設之責任 盡量介紹經濟建設之

實例，並討論生產改進之方法。

四、善盡發揚民氣之責任 積極方面，應表彰英

勇節烈之事跡，消極方面，宜鄙棄輕薄浮靡

之文字。

我國新聞事業，在最近四五年間，實有不少之進步。抗戰以來，進步更見顯著，舉其著者，如在能力方面，今之新聞記者，不惟諳習編輯之技術，亦多兼擅業務之經營；在內容方面，具體紀述之篇幅通訊日多，無實難社會新聞日漸減少，而幾於絕跡；在技術方面，多能脫膠物質缺乏之困難，運用精巧簡陋之設備，而提高出版之數量與速率；在服務精神方面，則能刻苦耐勞，能冒險犧牲。昔日新聞記者之工作，地點在編輯室，活動範圍多限於大都市之俱樂部或機關團體，今日新聞記者之活動範圍則為內地，為鄉村，為戰地與前線。昔日新聞記者對於終間與安適，今日新聞記者則多數緊帶堅實而勇敢，至於認識時代之使命，重視國家之前途，擁護國策，遵守法令，更與昔日之散漫紛歧者不可同日而語。新聞界之進步，足以發我國民族之進步，此誠精諦以來最可樂觀之現象也。總理有言：「宣傳即教育」，故新聞記者應為國家意志所由表現之喉舌，亦即為社會民衆賴以啓迪之導師。我國五十年來國民革命之事業，其由萌芽而發展而成熟，皆與新聞界有極深之關係；其消長進退之機，亦視新聞界之認識與努力以為斷；凡新聞界之努力，與建

國方針相適合者，則革命之進展必迅速，反是則必滯而多阻。今當全國努力抗戰之時，我新聞界為國奮鬥，責任之重大，實不亞於前線衝鋒陷陣之將士。如何宣揚國策，統一國論，提振人心，一致邁進，以達驅除敵寇復興民族之目的，而完成三民主義國家之建設，實為新聞界之積極奮起是賴。余以為上列諸點，應為今日新聞界共同奮勉之目標：

一 日善盡普及宣傳之責任

我國報紙銷行數量，較之並世各國，顯為落後，銷行區域，更為偏僻。大都市交通線之缺點。抗戰軍興，此弊漸見改進，今後趨勢，必為地方報紙之日見推廣。內地辦報，夙稱困難，然正惟困難，更有待於努力新進之新聞記者，宜以革路匪徒之精神，向困難最多而前途希望最大之內地，散播文化之種子，提高人民之智識，俟吾人之理想，宜使平均每五縣或三縣有一規模完善之地方報紙，印刷不求其精美，內容必期其豐富，補社會教育之不足，為地方進步之動源。

二 日善盡宣揚國策之責任

一切言論紀載，悉以促進我國民族獨立自尊心，養成我國民族奮鬥向上心為旨歸，處處遵守抗戰建國綱領，時時不忘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其對於國際局勢也，不惟求其詳實，求其精要，尤當以中國利害觀點為中心，而後讀者始感覺切而有益。其介紹國家重要政令也，不唯揭載法規之全文，尤當為之提示要點，解釋主旨，使國民轉輾告誦，由明法而進於守法。

三 日善盡推進建設之責任

南京圖書館藏

余以為我國今日，實已進入真正開始建國之一時期。故報紙之使命，亦隨之而入於新時代。昔日報紙之所重者為政治，今後應重在經濟與生產；昔日報紙採取新聞之主要對象，為官署為機關，今後應為農村為工廠為合作社，為一切生產之組織。報紙之篇幅，與其以人民不感興趣之普通新聞未數，無寧盡量介紹經濟建設之實例，並討論生產改進之方法。吾人理想中之國家，為生產進步國力充實民生充足之國家，則吾全國之報紙，即應於此方向多多致意，以為之先導。

四日善盡發揚民氣之責任

吾人今當努力抗戰，同時又努力建國，必善導國民，共履忠義奮發之正道，奸邪在所必斥，正氣在所必揚。故積極方面，應充分表彰戰區軍民英勇節烈之事蹟；消極方面，宜鄙棄輕薄浮靡之文字，帶種頹廢無

如何發揮訓練效能

——浙江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第一期畢業典禮致詞——

今天本省地方行政幹部訓練團第一期戶籍，政工，財務三班舉行畢業典禮的一天，剛才聽到教育長報告說：在訓練期間大家都能够本着苦幹的精神，向前邁進，教育長平時堅苦卓絕，以身作則，各位教職員亦能與學員共起居作息精勤不懈；這種緊張情緒在今天舉行儀式當中確已經處處可以表現出來，本人來參加觀禮，得到這種印象，是非常欣慰的！

自本團開始訓練後，教育長曾迭次邀約我來向諸位講話；因本身職務較忙抽不出時間，兼之自覺詞陋，沒有很好的意見可以貢獻大家，所以沒有來同諸位談過。今天是各位學員畢業離團之日，本請臨別贈言之，就感想到的幾點意見提出來向諸位說一說：

聊之氣分。吾人須知該團非即為枯燥之別名，而興味之養成。亦自有其方法。新聞界人十悉心研究，自能得之。此於教育國民實有其大之關係。綜上所述，皆為新聞界今日應負之使命，而暗示我人努力之方向。

中國經此艱苦抗戰之洗煉，其必能成爲一偉大而進步之國家，不惟我國民有此自信，亦爲世界有識人士所共信。然全功克竟之時，尙有待於吾人十年以上之努力。而唯新聞界之阻戰策進，爲效率更迅速而廣遠。我新聞界而日新又新，導國民以前進，則國民必相率而前進，我新聞界能同德同心，扶持我國運於共同之正軌，則國民亦自必集中意志力量，以趨於一軌，此則全賴新聞界在人才有新的補充。在技術精神有新的修養，以共負此千載一時之任務。余之此意，甚願吾新聞專修班畢業出校之同學，深切體會而力行之也。

李立民

關於訓練的意義，訓練的目的以及訓練的實施，剛才教育長在報告中都已很詳細的說明了，無容我再來贅述。但就訓練的成效上說，在抗戰以前，已顯示其重要性，如盧山訓練，峨嵋訓練，在全國黨務，政治，軍事，經濟各部門事業上都有很大的收穫；抗戰以後，當然在抗戰建國的過程中，爲適應大時代的要求，我們更需要各部門得力的幹部；但是在抗戰開始後幾個月中，一般青年學生或因學校所在地淪陷無所依歸，或淪於愛國熱忱中途輟學，多紛紛參加救國工作，但以組織散漫，多形成首動飄動的狀態，當時各方面亦因需要幹部人才，而有許多訓練機構的組成，於是各從所好，各就所需，終因教學方面間有未能貫徹原旨，致未收得預期的效果，甚至有些地方在受訓人方面發生下列不好的現

象：
就招訓學員說：每有投考的學員對於訓練機關需要何種人才，初未加以注意，自己亦無堅定的志願，如打算要學些什麼？預備做些什麼？或成爲怎樣的一種人？多未考慮過，只是趨時適勢，甚或以此爲個人找尋工作的捷徑，而忽略訓練方面的需要；這實在是一時不好的現象，要以這種幹部分配他擔任一定的任務，已是事與願違，恐難發揮什麼作用？這是值得我們檢討的。

再就訓練學員說：因爲訓練機關對事務方面分配的需要，要指定調某機關某種職務人員受訓，在受訓人員的機關，往往以訓練機關所指定的某種職務人員是離不開的，爲應付這種需求，就不得不臨時覓人代替，或竟委以某種職務名義，以求適合調訓的命令。這樣受訓終了同回原機關去，以所派職務名義，本自有入，只有另派職務，當然用非所學，又那裏能夠貫徹訓練機關的意旨？這在本省省訓練機關從前調訓縣政工作人員時是已經發生過的弊病；要是這樣的訓練下去，又能收什麼良好的效果？這也是我們應當加以檢討的。

還有若干訓練機關既無系統，無計劃；受訓人員又是抱這種態度，那裏會能造成健全得力的幹部？這種缺點，我們是要力加矯正的！現在我們的訓練團是怎麼樣？我們的訓練團是由中央訓練團一貫的系統下來的，訓練的計劃，亦是中央訓練委員會擬發的，并派酌本省地方幹部的需要爲分期適當之配合，至於招訓訓練的學員我們爲防止上述的流弊，已加以深切的注意，不使發生，主要目的就是要改造舊幹部，培養新幹部，求符合設置本團的宗旨，因此我們對於各學員前途的期望更是殷切！

此外關於諸位結業團的時期想提出來向大家說的，有兩點意見：
一、以受訓之所得見諸實踐，
二、以實踐之所遭再求改進。

先就第一點來說：

各位學員來團受訓已有兩個月了，在短促的訓練時期內，除專業訓練外，各位所受到的一般訓練，如軍訓方面，生活智能方面，體格以

及精神方面，可以說均有相當的進益，我以爲尤應注意思想訓練，辦事的方法和技術，以及業務演習，就是要每一個受訓人能真正信仰主義，奉行國策，貫徹命令，遵守紀律，辦事能迅速確實，成爲實現三民主義的信徒，與澈底奉行命令的戰士，以健全地方行政之基層幹部，爲革命建設而奮鬥，協力推行本省三年施政計劃，進而完成抗戰建國之使命。

總裁於六月二十八日對四川省訓練團首屆畢業學員頒佈訓詞中說：

「訓練之目的，乃在造成人民模範之模範，訓練幹部之幹部」，所屬鑒於受訓學員者何等深切！我們應當加體諒，益自警惕。誠以爲政之本在人，人在政舉，徒法不足自行，欲地方組織及事業之完善與開展，必須先備健全基層幹部人才。試以近兩十年來新興的國家而言，如蘇聯、德、意無論其所採取之主義及所定之國策如何，沒有不特別重視幹部之選擇，組織之嚴密，及紀律之整飭。斯大林常說：「決高舉者入也，幹部也」。固無時不在計劃入的向上，及着重各級幹部的改善；嚴索里尼對駐意大使在兩興發問：「對於意大利有什麼計劃？」他乾乾地地答道：「工作與紀律」，也就可知他注重的是什麼。希特勒自政治生活開始到執政時期，其一切措施更無不先從訓練組織，紀律着手，在他自著「我之奮鬥」一書中已反復言之，於此可見一個國之強盛，決不是偶然的！

在「縣各級組織綱要」中規定縣政府以下之區署設指導員，分掌民政，財政，建設，教育，軍事等事項，非經選訓合格人員不得委用，鄉（鎮）公所設民政，警衛，經濟，文化四股，並須有專辦戶籍之幹事，保辦公處設幹事分掌民政，警衛，經濟，文化等事務，照此規定，我們爲推行警政警衛各種事業，一省之中要有許多各部門基層得力的幹部總數分配，總裁於上年四月在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講演「確定縣以下地方組織問題」更有詳明的指示，爲使警政警衛聯成一氣，區於鄉鎮保各級應向採用警政警衛聯合組織辦法，並指出鄉鎮中心學校之高級班應注重訓練民衆，使能擔任戶籍衛生合作等事務，從可知「縣各級組織綱要」之實施，所應注重者何種事務，所應儲備者何項人才。將來地方事業日益發展，需要人才亦必隨之增加，本省訓練團第一期所訓練者備

戶籍，政工，財務三班，財務班並配有經濟反封鎖及糧食管理課程，將來逐漸按實需要分班訓練為各種事業之供應，兼為適應本省三年施政計劃之要求。

各位學員現正畢業離團，在訓練期間算告一段落，也就危工作實踐的開始，要時時牢記着 總裁所訓示：「成爲人民模範」模範，幹部之幹部」。以此自勉，不要忘却了自己的責任！訓練學員本有辦事之學識與經驗，再經兩個月的訓練，當更能充實其技能，堅定其意志；在工作方面，必須把受訓的精神發揚而光大之，更莫不不斷地檢討，矯正舊習慣，樹立新風紀，人人均能發生核心作用，以轉移風氣，諸位有來自淪陷區域的，有來自鄰近區域的，有來自後方縣份的，如果人人能因地因時因事之所宜，把受訓之所得，帶到每一個角落去，輾轉感應，時成風氣，則今日畢業離團之學員人數雖不多，收效必宏遠，因此不得不於第一屆畢業之學員致其無窮之希望，而加以醇切之勸勉！湘鄉曾氏有云：「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又云：「風俗之於人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將於諸君此輩下之。諸君要時時察必如何而後可以完成這種使命，持之以恆，守之以嚴，才不愧爲訓練合格的人員和縣各級行政健全的幹部，由此而養成現代公務人員之模範，倘於實施時不能運用，則此日所學即落空疏，切盼努力精進，諸君勉之！

次就實踐之所還再求改進來說：

總理曾昭示：「地方自治組織應爲一政治及經濟性質之合作團體，總裁於本年五月一日對四川省訓練團地方行政幹訓班訓詞亦指出「地方自治要以經濟爲基礎」，各位學員此次在團受訓就智識技能方面說雖係分班訓練，而地方自治事務頭緒繁多，互有連繫，決不是各管各事，不相過問所能辦理妥善的。即如上面所舉的縣政府和區署以下鄉（鎮）公所及保辦公處所應辦之民政，警衛，經濟，文化，戶籍等事務，無不息息相關。誠以從事地方自治，就是管理衆人之事之政治工作，如果各按職掌，各不相涉，不但事功之推進要受牽制，即對人民亦將發生不良的影響。現在各層級各部門的幹部尙未能普遍訓練，諸位離團以後回

到原崗位去，要認真自己的使命，如各部門辦事不屬詞，定有許多困難的問題擺在前面，倘無充足的勇氣，必致因循敷衍，甚或爲環境所支配而自敗，這樣便不能負使命，執行任務。我們遇到這種困難，就更要勵志，更要能實事求是的苦幹，以身作則，感導同儕，督率一般部屬人員，日積月累，自非感而遂通。然必先過學探討，隨時考慮，明其癥結所在，堅毅以赴之，從而請求辦事方法和技術，靈活運用，以求解決，並處處與民除弊爲民衆謀福利濟想，求人力物力財力時間之配合，要費力小而成功大。費時少而成功多，久之自能博得民衆之信仰，達到改進政治之要求，總之在工作方面，要於縱的系統上求命令之貫徹，橫的聯繫上求步驟之協調。

本團設有調查研究室，對於畢業離團散在各地工作之學員，當時時盡其指揮，監督，考核的責任，求工作效率之增加，各位學員如遇到工作實施上的困難，或有解決問題的經驗與心得，也要隨時報告到團，以供後訓練的參攷，如此不斷地相互聯繫，共求改進，總要使本團訓練的精神，能够彌漫全省，諸位在團步的生活行動，能够影響到一般民衆，而每個人對於政治道德和人格修養，尤爲先決條件，是要特加注意的！再次剛才聽到許委員舉出許多古人的名實來勉勵大家，也引起我一點意思，現在各位都要回到各縣去，所做的政治工作應與民衆有切身的關係，尤其在這抗戰時期，免不了要民衆盡力輸財，那就勞動服役而論，各縣仍間有不能持平辦理者，甚至苛派強索之事，未能盡除，我們於此是要切實加以檢討的。昔孔子稱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這就是行政工作人員能够奉公守法，仁民愛物，才值得稱讚；所以我也舉出這幾句成語供諸位體鑒。

最後我要引

總裁在四川省訓練團第一期學員畢業訓詞中放警策的幾句話來勉勵大家并以自勉，就是：「建國不殊羣羊，施政有同作戰，實事求是，綿密不漏，穩紮穩打，爭取時機」，「諸君於此離團分手之際，各人均宜盡其爲一荷槍實彈走上沙場之戰士，令後更應處處以作戰之精神，從事地方政治之建設」，我們要時時服膺，處處力行，無意無荒，以副屬望，諸位離團在即，我特重述此訓詞以驗吾人能否切實做到，并祝諸位努力！前途勝利！

印度。甘地。尼赫魯

萬湜思

——讀尼赫魯自傳(胡仲持等譯，上海青年協會書局發行)筆記——

一、印度

「現在印度與中國又重新接近起來了，這是值得我們欣悅的，她們是不同的，然而她們過去所共同的努力也多；也許在將來的時代中，她們可以共同努力，以她們所特有而助的民衆所欠缺的東西，貢獻給歐洲與全世界，因而幫助建立一個更有理性，更平等，更快樂的世界。」在尼赫魯特爲自傳中譯本篇的一篇致中國民衆書中會這麼說。真的，這兩個古國，「新共同的又何其多！」不幸的是過去所共同的可勝難的生命底光乎似乎不及他們遭遇中的困難與災難之多！但我們決然相信：經由他們今日的大悲其而再生的未來的中國和印度總有一天會共同在新世界的締造的大業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那時，他們將作爲政治兩方的科學與組織力與東方的思想與鑄爐，使機械底大力與人類底德性結合，換言之，環兩個文明古國，以他們歷史地理的深度與廣度爲溫室的他們的「深沈的思想」，將爲新社會奠定萬世不拔的基礎。

我們今天，是正在受着試驗！中國的對德抗戰，持續了三年多，我們也要抵抗下去，直到日本帝國主義被我們打落海，那纔是我們直負使命從事大業的開始。而印度則一百八十年來在英帝國主義的統治下幾無日不在受着地獄的餓火，也就有到這種火的火鐵撲滅，增場中的

鐵流重又堅固而且變成空前堅強的時候，那纔是她負使命從事大業的開始！

是這種命運相似的兩個古國！作爲中國子民的我們，應該怎樣努力去求得對同伴的了解了呢？於是，我樂意介紹這本尼赫魯自傳。

當我讀完本書時，在我心上似乎明瞭地描上了三輪輪廓：(一)印度，(二)甘地，(三)尼赫魯。現在我即給複寫在此地。

(一)印度

對於印度，我們了解的太少，它有一百六十萬方哩的廣大土地，它有三萬萬四千萬則佔全世界所有五分之一那麼多的人口，似乎都不是我們所記憶的。在我們一般人的觀念中，祇感覺印度是一個古老的謎一般的的地方，她曾經放射靈魂底光乎，但那都是謝落的舊夢了。現在她是貧窮衰落，歷有着古老傳統和現時苦難的過重的担子，在恥辱與悲哀中喘息，無奈地讓異族和削着！而對於住慣洋場的中國大眾則對於印度實情儘管一無所知，可是「紅頭阿三」的棍棒和皮鞋倒領教的似乎頗多了！

我們意謂：印度與中國，對於東方弱小民族未來的命運，與整個世界未來的新秩序，無疑的將是決定的兩類力量，對於這國際伙伴怎能單單從被奴役的阿三底胸與棍棒上去接觸呢？

那麼，尼赫魯的自述是值得讀的了，牠雖然偏重於追尋他自己智慧發展的過程，但多少少向我們報告了一些印度的真面目。

一個民族長久受異族統治，是容易墮落的。一般人民底性靈因此容易變爲稀淡，他們底生活往往被惰性和傳統的消極的重重所壓倒，少數的志士則又容易流於憤慨與執拗。這時，要求有一個中行的致力復興與革新的政治家往往舉難事。這便是我的所以視印度底混亂與甘地的存在爲尋常，而對於印度的不息的鬥爭與對於尼赫魯我却有崇高的敬意！

今日的印度是怎樣一個地方呢？從尼赫魯的記述中，給了我們一個先提的印象，就是：這英帝國的倉庫，這英帝國的殖民地——在她那裏，今日明日都有紊亂，受難，犧牲，與鬥爭！

印度連印度的王公們在內，都是隸屬於英國的宗主權之下，但英國政府只有在爲保護或推擴英國的利益時，才關心他們，說「關心」實在是不當的，我們看看所謂英國給印度的關心是怎樣一回事：(一)他們以鐵路，電報，電話，無線電一類的東西作爲吸收印度全國血液的脈路與血管，他們爲加強帝國的根基，擴大英國商品銷路的市場而計劃，而工作，這樣的目的英帝國是達到了，而他却說這是英國統治帶給印度的文明與恩惠。(二)英國統治的特點，是集中一切，加強他在政治和經濟上對印度的控制，財政方面，稅則是非常不合理的，惟較小的人的稅額被得自進款大的要多得多，而這些收入又都歸付軍隊，警察，行政機關，和信息的開支。市民的幸賴，應爲英國

的利便而犧牲。其他如義務的和普及的教育，改善公共衛生，推廣貧窮，和勞工疾病，退職及失業的保險等等，從未被提及。在政治上他御用的王公，官吏，沒有一點「今日印度人爲人的道德」，在他的管轄之下，不准透露一點民族主義的氣息，他禁止民族主義氣味的教科書在學校中通用，甚至民族領袖的照相也不准懸掛，他的警察，時常用來壓制地應加以保護的民衆而自認爲唯一的成就。(三)人民的的一舉一動都將被察明其動機。尼赫魯說「政府威迫的利器不斷地壓迫我們，羞辱我們。……在我們自己國內，我們來去像被囚犯，受人釘梢與監視，我們的舉動都記錄下來，否則它們違反無所不及的叛亂法，我們的通信被拆」。無日不緊隨着印度人民的舉動，緊急法，人權剝奪。自由在這裏是不可思議的。連一個人死

的紀念自由都被警察禁止。(四)監獄的成績，便是英帝國對印度統治的成績。「橫暴的精神，甚至在監獄中緊迫着我們的人民」，其殘忍，至於使囚犯對於殘忍的感覺變得遲鈍了。一切想不到的毒刑都被發明採用着，在那裏誰凶惡誰便是大勝利。「若干獄卒被大家認爲特別兇惡不法的，即有得降官」。誰都見了這樣的監獄害怕，但是，對於被囚者，監獄常尤勝於其他可憐的事情。對於我們，選擇的事是：下賤地屈於政府權力，精神上墮落，否定真理在我們一面，和在道德上變節給我們認爲卑鄙的志願。——或者反抗而受其一切結果。

(五)異族統治者助長着印度國內的分裂傾向和宗派主義，使未來的進步受到重大的障礙；外人所統治的政府助長着卑屈的心理，限制精神的範圍；竭力推毀青年期最好的優點，使之喪失，冒險精神，創造性，和勇氣等等——而致舞卑怯，民憤，詭媚和奉承上司等惡行。

結果在政治上造成一種不會養成真正的服務精神而祇是發展官僚的性質——「事務員的充分學識和保守驕傲的外交手腕」——的風氣。最後是使整個印度民族墮落。

英國人就這樣依照他們的願望來締造印度，所以一百七十多年來，印才的偉大力量被禁錮，自由的呼吸被窒息，貧困出人意外，人民無法抗拒疾患和傳染病，大多短命死亡；文盲非常普遍，廣大地區缺乏一切經濟設備，在一般民衆中，連中等階級中，失業的人數非常驚人。總之，在這國度裏，對於生命的壓迫的感覺隨時隨地襲來。

永遠沒有甯靜的日子，永遠沒有民主的空氣，永遠沒有平等的生活，作爲一個殖民地國家的映現，印度是最適當和最極端的了。

四 最近一百八十年，不是一個短暫的時期，異族的統治，竟使得印度人的生活本身逐漸地變成了空氣沉澱水流緩慢的一條泥河，在這泥河底裏，一切正在沉澱和腐爛！民族的精神在生疏着，我深覺得這真是印度民族的大患。

(一)在這裏，有所謂自由分子的官員，當國民大會大衆向現行秩序取攻勢的時候，他們被政府利用來對抗大會。這時候，政府稍稍給他們一點體面，他們便自詡是他們的特殊權利；等到大會的攻勢撤銷，他們又茫然地抱怨一陣。(二)在這裏，有自以爲有政治主張而害怕變動和運動的自由派。他們被周圍的風暴所驚慌，四肢無力，坐在他們獨特的心理監獄裏，轉來轉去。找不到出路。隨處碰壁，亂用無用的方法，當一九三三年和平抵抗繼續實行期中自由派的領袖薩斯德里却宣謂「無論我們受英政府的侮辱，壓制，恥辱和剝削怎樣多，承認英政府的決定，却等於一種宗教，這是命

運，我們全體必須向他俯首」，同年六月尼赫魯坐在牢監裏，又讀到他的演說，他指出「如果英國影響突然撤退，印度政治運動就有以仇恨，迫害，和黨派的互相壓抑爲特徵的危險」，並且說「寬容始終是英國政治生活的一個特點，印度的將來越和英國合作解決，印度盛行寬容的可能也越大」。他還指斥蘇德重奪自由，好像英國人給予他的都是「自由」似的。

尼赫魯等他們「滿是灰色思想的印度」，總是懷疑，猶豫而審斷，「他們做了病態政治上的赫爾曼說」。(三)這裏有「從窮人方面來選舉票從富人方面來選舉票」的「調子供養」的「自主派」，他們是出色的機會主義者，他們的心門向祇爲的想做大臣或省參事官。(四)在這裏有「經過了半革命的行動的時期，便回到平凡的生活和活動」去的中等階級的國民大會工作人員，他們的革命情緒很容易滅絕，不久便「肉體肥胖了」，精神傾向於安全了。

(五)在這裏有今日「做着政府裏的大臣和高官」的昨日的「監犯」，最精明地壓迫着印度民族運動的就是這些傢伙。尼赫魯說「這些新貴們在這項差使上，比什麼人都發得精明。他們認識我們，知道我們的弱點，以及怎樣來利用這些弱點；他們熟知我們的方法；他們有着些羣衆運動的經驗，懂得些大眾的心情，正如同他們懂得方法，比價廉的英國官吏和自由分子的大臣都更能更精明地壓迫他們那些國民大會的老同事們」。(六)在這裏有所謂「囚犯看守」，他們容易受利誘與當局合作，爲了恐懼，希望報酬，和特赦。到監獄裏的偵探制度多半使他們執行着。(七)在這裏有「企圖借了民族主義的名義，來保護他們未來

的利便而犧牲。其他如義務的和普及的教育，改善公共衛生，推廣貧窮，和勞工疾病，退職及失業的保險等等，從未被提及。在政治上他御用的王公，官吏，沒有一點「今日印度人爲人的道德」，在他的管轄之下，不准透露一點民族主義的氣息，他禁止民族主義氣味的教科書在學校中通用，甚至民族領袖的照相也不准懸掛，他的警察，時常用來壓制地應加以保護的民衆而自認爲唯一的成就。(三)人民的的一舉一動都將被察明其動機。尼赫魯說「政府威迫的利器不斷地壓迫我們，羞辱我們。……在我們自己國內，我們來去像被囚犯，受人釘梢與監視，我們的舉動都記錄下來，否則它們違反無所不及的叛亂法，我們的通信被拆」。無日不緊隨着印度人民的舉動，緊急法，人權剝奪。自由在這裏是不可思議的。連一個人死的紀念自由都被警察禁止。(四)監獄的成績，便是英帝國對印度統治的成績。「橫暴的精神，甚至在監獄中緊迫着我們的人民」，其殘忍，至於使囚犯對於殘忍的感覺變得遲鈍了。一切想不到的毒刑都被發明採用着，在那裏誰凶惡誰便是大勝利。「若干獄卒被大家認爲特別兇惡不法的，即有得降官」。誰都見了這樣的監獄害怕，但是，對於被囚者，監獄常尤勝於其他可憐的事情。對於我們，選擇的事是：下賤地屈於政府權力，精神上墮落，否定真理在我們一面，和在道德上變節給我們認爲卑鄙的志願。——或者反抗而受其一切結果。(五)異族統治者助長着印度國內的分裂傾向和宗派主義，使未來的進步受到重大的障礙；外人所統治的政府助長着卑屈的心理，限制精神的範圍；竭力推毀青年期最好的優點，使之喪失，冒險精神，創造性，和勇氣等等——而致舞卑怯，民憤，詭媚和奉承上司等惡行。

的利益」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反對任何滿腔的政治改革，他們希望英國仍在印度作為一決定因素。他們需要英國人，只是為了維持現行社會機構。那長既得利益，來對付印度自己人，對付充分的民主，對付羣衆勢力的澎湃。他們原來祇在等待，「當倫敦一招手，等待時期告結束，他們便齊集去取得他們自己特殊利益的保障，和分清未來更多的掠奪利益了」。(八)在這裏還有說一口動聽的話鼓勵自治運動並號召國民，不惜爲了擴大運動而犧牲的「勇敢的民族主義者」，他們原來以此，據說他們本身的事業與利潤，「當許多被地下獄或遭木棍毆打的時候，他們都坐在會計室裏計算他們的錢。後來當進取民主義辭退危險時，他們就轉而擁護一極端主義者」而跟別派交陪



刻木思涅萬

像魯赫尼

此磨擦，消耗國家力量，其耗費用也沒有東西。他們多跟印度與英國的最反動的份子密切勾結，實際上反對政治的，甚至社會的進展，他們所要求的跟大衆毫無關係，唯一真正的目的，是在使居於高位的某些小集團，得進一步的昇遷而已。至於教社之爭，在印度則更是根深蒂固的了。一方面，回教徒害怕印度教徒人口的繁盛，另一方面，印度教徒怨恨回教徒的強橫。很多的印度教徒覺得回教徒在程度上太盛氣凌人，在行徑上太巧而委奪了，由於這一層，印度教社的勢力發展起來。於是印度教教社和回教教社的傾軋日益劇烈了。這是一種爭執，悲淚被似乎真爲難，尼赫魯說：「至於屢屢提起過的印回兩教團結的呼籲，雖然有其意義，但實

了」。(九)在這裏有逼迫政府壓迫農民的地主，使得幾千幾千的佃戶逐出田園，小小的財產都被沒收。這些地主和國民大會完全處反對地位，「他們在和平抵抗時期，公然盛氣凌人地自稱站在政府方面，政府在各省通過鎮壓的立法，表現在緊急法令中，就是得他們助力。在聯合省參議會中大多數地主份子都反對釋放和平抵抗的囚徒」。(十)在這裏，有一以印度爲犧牲而買賣金銀的金融冒險家。(十一)在這裏有一官半職的印度人，雖不直接升職，請假甚則，對付，週迴，以及磨擦細細的官場辦事。靈魂墮落，間接地抽去印度國民的精神。(十二)在這裏，有所謂「紳士們」，他們一向對土地和國民大會，看到國民大

會滿有地位時，又來巴結大會和它的領袖們，等到情形一有變化，却又大聲斥責大會及其一切工作，並登報聲明他們與大會毫無關係。這人性的非常變通的一面，只有他們覺得權力與成功所在的地方，他們便趨向它，而且帶着輝煌的笑容，加以歡迎」。(十三)在這裏有自認「在教育，態度，和人格上和英國人一比，就敬歡的富生和一個高貴有本車的人相比如一轍」而自嘆不如，深覺得「英國人是有理由把我們看作魯赫的吉特的」的志士的留學生。……

除了這些，我們還知道印度存在着更嚴重的問題，即黨爭與教社之爭。印度人似乎頗不宜於從事政黨活動，但在印度，這種黨爭名目的所謂政黨也甚多，實際上呢除了增加彼此磨擦，消耗國家力量，其耗費用也沒有東西。他們多跟印度與英國的最反動的份子密切勾結，實際上反對政治的，甚至社會的進展，他們所要求的跟大衆毫無關係，唯一真正的目的，是在使居於高位的某些小集團，得進一步的昇遷而已。至於教社之爭，在印度則更是根深蒂固的了。一方面，回教徒害怕印度教徒人口的繁盛，另一方面，印度教徒怨恨回教徒的強橫。很多的印度教徒覺得回教徒在程度上太盛氣凌人，在行徑上太巧而委奪了，由於這一層，印度教社的勢力發展起來。於是印度教教社和回教教社的傾軋日益劇烈了。這是一種爭執，悲淚被似乎真爲難，尼赫魯說：「至於屢屢提起過的印回兩教團結的呼籲，雖然有其意義，但實

際者無價值，除非竭力去探討不團結的原因。——自從一八五七年的暴動之後，英國政策跟自治問題的關係，只要我們加以追跡，便可以看出英國基本的目的，在阻止印回兩教的團結，並使他們互相衝突。英國對回教的壓迫要比對印教的沉重。他們認為回教徒是侵略的，勇武的，不近年來在印度的統治的距離又極遠，在政府中亦得不到什麼職位，所有這些，使他們成爲被嫉視的人物，印度教徒却跟這相反，他們有學習英語的機會，亦得到官員的工作，因此他們看來是比較馴順的。英國人就利用這兩種不同的教社的弱點，挑撥離間，使他們永遠不斷地自相火併。

由此可知如果英國的統治存在，想消除教社之間的鬥爭是困難的，但是我們站在印度這一邊，話就不該如此說法，我們應該希望印度能有大毅力在印度與英帝國的大矛盾之下使印度內部的低階階下來，祇有播出了英帝國的統治勢力以後，彼此才能覓致相安的路徑吧。而且也祇有求這一鬥爭的漸漸完成，印度底水洩下的一切流澤與腐菌才能逐漸消除，她各方面的合理生活纔有可能。因爲像我們所熟知的：凡是企圖奴役的人總是怕被奴役的人團結和上換的。奴隸總管和奴隸們的「普浮與無恥」，正是主人利益的保證！

我們相信，印度是有大毅力的。當我讀尼赫魯自述時，對於這古國，我刻刻想起這兩句話：「一面是荒淫與無恥」，「一面是嚴肅的工作」，我們雖然痛感印度派泥河裏的腐菌之多，但我們也漸漸地看到她正確的戰鬥一直都在進行，犧牲了家產幸福無時無刻不準備坐坐監的尼赫魯的一生何是最好例證。在印度，像他一般勇敢的男人也不知有多少，他們

非入獄不可的時候，便以「我們爲大義服務」的自喻擔監獄去，他們自誇「大義不曾挫折，依然持續；倘使理想不滅其光明，精神不挫其銳氣，那就不會失敗」。譬如：在邊省有被稱爲「邊省的甘地」和「帕坦人之光」的加發爾可汗，他在那裏一村一村去過去，設立紅衫會，不久便佈滿了全省，在印度民族解放的大前提下，推行有紀律的運動，他的行動，在印度各地人民的影中，成了一個英勇不屈的民族勇敢和犧牲的表徵。印度有著非常多的實力和潛伏力，就在這些人（另外還有非常的多來一）的努力與影響之下在發展着，滋養着，蓄積着，準備一次最後的翻身！這一種發展，滋養着，蓄積的工作，我們已經屢次看見它射出不可遏制的的光芒。我們猶記得在一九三〇年破壞鹽法鬥爭中，在邊省，有加哇利兵士拒絕對和平民衆開槍的有名事件，在通常，士兵即使同情民衆，也不會採取拒絕長官命令的嚴重步驟的，加哇利人所以這樣做，正說明着一種觀念，就是他們爲英國國力已趨崩潰，並且對於本身底力量有了自信。這一種估計可能是錯誤的，但是當這樣的觀念盤據了所有的人心，且能够正確地把握和利用環境有利條件而戰鬥的時候，便具不可抗拒的民族潛力的發揮！那時被壓迫民族的高潮，足以掩滅一切！

對於甘地，這「印度聖者」，我却不敢說，惟恐這觀念妨礙我對他的公正的認識，我會試以格外的好感讀尼赫魯對他的印象，而結果，祇使我更進一步的覺得：甘地之足以令人敬服者遠不如他使人厭憎的來得多，因爲我相信，尼赫魯對他的認識是最公正的。

(二) 甘地

綜合尼赫魯的話，對於甘地，我們可以得出這樣清楚的一個輪廓：

他的意識落後得驚人：——一九二九年倍哈爾大地震，當尼赫魯等從事救濟災民工作，並爲文批評政府荒惰，而引起了護護政府的人的憤恨時，甘地却發表了關於地震的大文，他說：「地震是對不可觸性的罪惡的責罰」。我們很難了解甘地說這話的用心如何，但是以他的地位，這話將以最惡的宿命論的毒素欺騙人民的心上是有無疑的。所以連戈爾都說他「再沒有一種說話比這更違反科學的了」。至於尼赫魯的感這更引我們爲甘地感覺的不忍！「說人類的習慣和罪惡會使地壳因之動搖，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就說地震是神靈對罪惡的責罰吧，那麼我們要怎樣去發見那被責罰的罪惡呢？——我們亦許因爲屈從在異國統治下而受害，亦許因爲我們來推銷不公平的社會制度而被罰，——但怎樣來說明倍哈爾那無數無辜民衆的損失呢？——難道是英國政府因和平抵抗而要求神靈加以責罰嗎，因爲事實上倍哈爾在自由運動中居於領導地位，而遭受的結果也最重。——於是我們開始懷疑天神爲什麼要和我们開這樣殘酷的玩笑，創造一個殘酷而可憐的世界。造了老虎又送了羔羊，而回頭就來給我們以責罰。』又如一九二六年英國礦工因爲反對減低工資而發生巨大停業和罷工時，甘地發表意見認爲礦工這樣下去一定吃虧，因爲問題是在於礦工人數過多，應該以確切的方法來減少人口才好。他在答覆英國某來信中還要寫着：「祇要礦工們沒有小孩，他們就不會要求改良生活，亦不會要求增加工資，他們需要飲酒、賭博和吸煙嗎？亦許有人回答說：礦主們吃嗎？什麼都來一手，然而他們都佔居上風，這回答是對的嗎？要是礦工們不說他們比資

「本家好，那麼他們有什麼權利要求世界的同情？」如他所说，以「工上的土山」為「引起世界的同情」不够填似的，因為在他意謂：「較高的生活水準和開墾，將引起自前和罪惡！」尼赫魯讀到這信時覺得很難過：「那些飢餓和消瘦的英國礦工及其妻兒們，便出現在我眼前，就在罷工的那一年夏天，我曾經親見過這些正在飢餓地、可憐地與感悼他們的可惡的制度掉鬮着的人們，甘地所舉的事實可並不正確，礦工們不是要求增加工資，而是反對對低工資和停工。至於利用遊艇以解決產業糾紛的問題，雖則特別，那更是可笑的了，他又非常敏捷於他的手紡運動，這運動會給印度以直接的好處（譬如暫時地幫助了目前受苦的農民），是真的，但是一味相信它的力量以至反對機械和工業主義，這將遺過不可避免的失敗，他似乎沒有想到。他發表論文說：機械化當人手過少時是好的，但當需要工作的人手很多，像目前的印度一樣時，牠都是壞的，我們的問題不是怎樣使貧在農村中的千百萬人得到開墾，而是怎樣去利用他們的空閒時間，他們一年只有半年的工作。」關於這，尼赫魯曾嚴正的指出其錯誤。印度需要經營的工作至少在五十年內以全體印度人的辛勤，也難以完成。祇是在自現的現制度下，那種工作對於僱主少利可圖罷了。許多等待着的事業，「只有在動機是為社會的進步，而非為個人的利益，以及各方面為着公眾的福利而組織牠的情形下，才有完成的可能。」所以印度民眾決不缺乏工作，而是「圖爭還不够得到合理的政治地位，和沒有工作的利益和增進文化的機會」之故。

「他的路雖正路總是那麼遙遠，——尼赫魯曾經這樣苦惱着批評甘地，他曾經企圖影

響甘地使之走上社會主義的道路，「當時我認爲他是會採取基本的社會主義的立場的，因為我覺得在這個充滿着暴力、邪惡和苦痛的現制度下，除此之外便無其他的出路」。但後來終於認清：甘地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的目的之間，可有看根本的差異。甘地一點不關心現代科學和工業技術，如果為大眾的利益服務能够充充分地解決每個人的衣食住行並入地提高生活水準的這件事，他因為不希望民眾抱增進幸福與開墾的幻想而甚至不願如此，所以「社會主義的預言絲毫未曾誘動甘地」。社會主義也有缺點他是身受着的，所以他也不喜歡，但是就兩者要他抉擇的時候，他甚至「寧要後者」，據說「因為牠是邪惡較輕，而且是不能不加以承認的現存制度」故。明瞭了他這一點，那麼對於他那許多單俗的矛盾的思想方式，也就毫不覺得驚異了。譬如：他以「慈善」為人類主要的美德，為什麼呢？因為他時常強調封建土公、大地主、和資本家是窮人的受託者的觀念，為什麼他有這種觀念呢？大抵因為王公、大地主、資本家「我們不能不加以承認的」王公大地主資本家，而窮人則是命定的窮人故。在他給契卡爾的信中說：「我盼望王公們把他們自己看做而且事實上亦成為他們所統治的農民們的受託者」，這與靠販賣人類精神底鴉片為生的羅馬教皇的話有什麼兩樣？——「富者應把他們自己看做上帝的奴僕，保護者，和他的財富的施捨者，耶穌基督本身是把窮人的命運託託給他們的」。甘地這種思想，其實早在一九一六年他過訂子了，比那利斯的印度大學舉行落成典禮，他對許多王公們演說，勸他們廢棄華麗和奢侈，多行善事，「王公們，請你們賣掉你們的珠寶！」他這樣說。接着是「王

公們三五成羣的離開會場，甚至主席本人亦溜出去，在非常狼狽的情形下，讓甘地一個人自拉自唱」。但是他很強硬，不，很固執，不，很頑固，一九三四年七月他在北拔演說稱讚地主制度，又說地主是佃農的受託者，他到大地主說：「我的目的深入你們的心感化你們，這樣，你們就會為你們的佃農們保管你們所有的私有財產，而且大地都用以增加他們的福利！」假如有人不公平地剝奪你們的財產時，我必定跟你們在一起戰鬥」。

他常常這樣使人失望，甚至和他放親近的入便尼赫魯等都常常在他那裏感受突如其來的失望。譬如一九三一年他與里談判，甘地與伊爾文簽訂協定，其中關於憲法問題在未來討論時範圍受到限制的那一條，是使印度求獨立的目的人受危害的，事先沒有跟其他工作委員會的領袖討論過，甘地却退却着承認下來了。「我知道，不論發生什麼事情，甘地的辦法，總是提議和平」，尼赫魯對甘地感到失望是不止一次了。當安達孟島的政治犯因獄待過問題同盟絕食及外面進行和平抵抗時，甘地在浦那召集入會，勸他們暫停絕食的和平抵抗，一面接連發電報給總督要求和會面，「並說了些關於「榮譽的和平」的話」，總督却答之以「否」。他常常做這種喪氣的事情。

行動表現於政治上的甘地似乎是一個頑強的人物，他眼着小節的時候多，他小經意地重說着自己細緻的感情時的時候多，即使因此分散了羣衆守的目標，他也往往不加以放寬並且不以為意的。他被感與織內是禁欲，自毀愛難等等，「趨向他道德的生活，盡量減少自滿，與其在於物質上使民眾的生活提高，勿如降低他們自己的水準，與民眾過着同樣的生活」，他

強調戒絕色慾戒絕烟酒等，個人縱行爲的戒絕，當然是要緊的，但他把這些時刻和政治運動一併呼喊着，這就難免使人厭煩。尼赫魯曾問過：「戒絕色慾戒絕烟酒！」這些個人的缺點，難道要比爭利、自私、貪婪、爲個人利益而起的猛烈衝突，各集團和各階級的殘忍鬭爭，某集團和階級對另一集團和階級的慘酷的壓迫和剝削，和半國之間的恐怖的戰爭等等更爲重要麼？不錯，他痛恨一切的暴力和卑劣的衝突，但在今日這貧婪的社會裏，在他那門有力者奪取之，能守者保有的——這語言之下，這些難道不是必然的嗎？現社會自私自利的動機必然要引起這種衝突，而整個的社會制度又保護他們，充分鼓勵掠奪的精神。——如果社會能神這些動機和野心，並吸引了我們中許多最有能力的人們，那麼，甘地還希望達到他的理想，所謂道德的人嗎？——這已不僅是道德的或是倫理的問題了，這是當前一個實際的和迫切的問題。

從這些看，甘地顯然不能以滿足衆人的希望，但是他倡導「和平抵抗」多年，尼赫魯說「自從甘地在印度政治場景上出現以後，在大眾方面他的聲望一直沒有減退，而且可以說，逐漸地增進着如今還如此」。這又怎麼解釋呢？專制制度，作爲一個政治領袖，甘地，固然缺點很多，可是亦自有其所以成功之點，在政治上，招致成功的種種因素，往往未必就是一個人的優良的性質！

那麼，甘地過去所以成功的因素到底是什麼呢？

我以爲最主要的一點是因爲他頭戴尼代表着印度的農民大眾，或者說他在異常廣大的程度內代表着印度，而且，表現了這古老而受

難的國度的真正精神」。他的某些意識是落後的，而印度千百萬民衆的意識多半正是落後的。尼赫魯說他「是印度農民大眾的化身」。他差不多等於印度」。是最正確的等。他具有印度的一切優點和劣點。同時他又不是一個普通的農民，還有良善的感情，優美的情趣和特殊的智力，他能够直覺地感到人民的意向，並知道發展和行動的條件何時才成熟，在適當的時候來號召。所以尼赫魯說：「我們時常感覺到，甘地認識印度要比我們深刻」，他合時地反映了羣衆的希望和需要，甘地之所以能取收效的磁石一般吸引羣衆在地的周圍者也就在乎此。

其次我們不能不說到他的性格。甘地不但很合式地領導了印度農民大眾，而且使許多不同意他民生哲學或甚至不同意他許多理想的人，跟他在政治、聯合，且有時還成爲他的忠實信徒。這並非如許多人所提出他所主張的什麼意見，多份倒是由於他那獨特的人格緣故，以從內心上，道德上，精神上改善個人，作爲達到社會改革的理想的唯一的子孫，在這些階級社會的目的是無能的。但光，對於獻身社會改革事業的人，尤其是對於作爲領袖的，道德便到處顯得重要，尤其是在印度這樣的國家。它使我們的人格輝煌，發出一種制取靈魂的力量。甘地的自奉之儉約，以及他對印度的服役之巨大，竟「使民衆被縛得到組織和剛毅，紀律和容忍，爲理想而愉快犧牲的力量，以及爲他的自謙和自尊等所薰陶」。他雖然有時候容易讓步，和提倡讓和，但整個的印度都能够出裏信賴他決不會出賣大義。——因爲他是一個任何恐懼都不能使之退縮的天生叛徒，亦是一個從事巨大改革的革命者」。

由此可見不是偶然的，但是我總就心，像甘地這樣的人要領導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至於貫徹其目的，恐怕不免有困難的。他的缺陷到底太多！連許多跟他一致行動的最親近的伙伴，都感他行動和支持行動的思想分開；就這一點，便很危險了；因爲生活的哲學不是同，單靠人格彼此信賴，能够同走的路途總是有限度的。實際上，像尼赫魯就已經不止一次爲了甘地，惹起精神上的衝突和紛亂的了。而且，他所以感有羣衆的道德方面的因素之一——自我善行，仔細分析起來，訴諸理智的似猶不及訴諸情感的時，大家都會覺得甘地如果在別國，是開過的多的人物了，但印度仍然尊重這個「高談者罪惡，解說而非暴力」的宗教上先知型的人物」。傳統的「印度」神話充滿着偉大的苦行者的故事，他們憑捨犧牲和自我苦行等嚴酷的精神，建立了一座「真德的山」，終於感看「某些較小的神的統治，和傾覆了現存的秩序」而替民衆造福。民衆的尊敬甘地實際上恐怕就帶着這種原始的「神」心理的，這作爲政治上的信賴，也是聰明的。

其實，他那著名的「非暴力」的抵抗方法，在我們看來，也是漏洞很多的脆弱的方法。譬如一九二二年尼赫魯等爲了和平抵抗在牢獄裏，民衆的情緒正激昂，運動正在各方面前進的時候，却「驚恐地聽到：甘地在我們的鬥爭中間已經停止了攻勢的姿態，撤消了「和平抵抗」了」。爲什麼呢？因爲「可利、可刺村」附近發生了事變的緣故，那地方有一羣暴民爲了要對幾個警察報復一下，在警察所放了火，燒死了住在所裏的警察五六名」。這事件事違反了「不合作運動的精神」，因了偏僻地方的一個鄉村和一小羣憤怒的暴民，竟使爭取自由的民

族鬥爭停止，這不是證明「非暴力」的鬥爭哲學和技巧上一定有着什麼缺陷嗎？我們知道，在一個大政治運動中間，要求參與的無數民衆個個有「滿發功夫」是不可能的。而且，敵人如果明白了如此的「非暴力」哲學，那麼他們始終有可能創造出環境來，使我們必然歸於放棄鬥爭了。尼赫魯說得好：「在我們看來，要担保不發生這種一類的意外事變是不可能的，難道我們必須讓印度三萬萬餘的人民在不合作行動的理論和實際上都受了訓練，方才可以前進嗎？即使如此，我們有多少人敢說，我們在警察方面極度的挑撥之下，還守得住十分的和乎呢？況且我們的運動中間，說不定混雜着許多暗中搗鬼的暗探和破壞份子，他們自己幹着暴行，還發動別人幹着，那怎麼處置呢？如果「非暴力」的抵抗方法，運用起來就如此，那麼這總是免不了失敗的」。

甘地當然不肯承認這些的，而且他往往能够以最美觀和動聽的話一時間說服別人，使人聽了明明感到他很多矛盾也不能不怨他多少有此道理似的。一九二〇年他寫過一篇著名的論文叫做「非暴力」，在那裏他說：「我深信，一到只有在懼怯和暴力兩者之間可以來一下選擇的時候，我就要主張暴力了；與其印度在怯懦的狀態之下，做着含垢忍辱的無告的犧牲者，我是寧願使得印度動用了暴力來平衡自身的榮譽的。然而我却相信「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無限，寬恕則比懲罰更有大丈夫的氣概」。「寬恕是足以修飾軍人的品格的，可是只當操着懲罰的權力的時候，自制才算得寬恕，如果懦弱無能的生物要行使寬恕，那就毫無意義了，鈍子一動也不動地輪轉着粉碎，這是算不得鈍子寬恕了錯的；！然而我却不相信印度是懦

弱無能的，我不相信我自己是懦弱無能的生物。！！」「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吧，力量並不是從體力上發生，却是從不屈不撓的意志發生的。！！」「因此，我敢把自我犧牲的古代法則，擺在印度的前面，！！在暴力中間發見了非暴力法則的古印度的聖者，是比牛頓更偉大的天才，他們本人是比威靈頓更偉大的戰士，他們懂得了武器的用法，便即覺悟到它的無用，而教凡世的人們，救世的手段，不在暴力，而在非暴力。」「非暴力在共有動力的狀態中間，那意義就是自覺的交雜。這並不是說對於作惡者的意志的馴服，却有着拿自己的全靈魂來反對暴主的意志。」「我並不是因為印度衰弱該故，才請求印度實行「非暴力」的，我要印度一面帶着本身的力量和權力，一面實行着「非暴力」。！！我要印度認識它有的是不滅亡的靈魂，這能够從各種物質的衰弱狀態中間升發起來，抵敵全世界的物質的綜合力量。！！」「那些所不能捱受民族恥辱的人們是要發作心頭的憤怒的，他們會採取暴力手段，那麼我想他們一定是從暴政之下救不了他們自己，也就不了國家而落到滅亡的。如果印度採取了劍的教條，它也許可以獲得一時的勝利吧，那麼，印度就不再是我心頭引以自豪的民族了。這說來確是屬實動聽，但是我們如果將他的話仔細分析起來，就覺得它底含義遠不如它底文字來得豐富。同樣這一講話，如果出諸強者底口裏而能够以行動來證實，價值可以無限，不幸却出於印度的甘地口裏，那就很少意義了。這話一定損及甘地底自尊心的，他不承認印度衰弱。相反的，印度是「操着懲罰的權力的」，因為照他的說法祇有當這時候，「自制才算得寬恕」，非暴力才有意義。但是

我總奇怪，受了英國一百七十餘年的殘酷統治，在甘地看來印度難道還不够「含垢忍辱」嗎？印度「操着懲罰的權力」，我也覺得這是名言，因為在本質上，印度的確有可能對英國操懲罰之權，但是印度如果採取甘地過去所用的方法，這一種權力是永不能發揮的。所以尼赫魯說：「非暴力的方法，！！個人把他當作宗教，當作不能改變的信條，也未始不可，可是任何政治運動，在其保持着政治性的時候，却不好這麼辦」。

如果以魯訊所寫的「阿Q精神」來窺測甘地，我覺得是不忍的，但是從他過去底言論與行動來看，最成全他的一句批評也祇能這樣說：「甘地是個精神上的強者」！他不是一个最好的正常的政治領袖。作為一個偉大的革命者，記得誰說過，至少他應該具備兩種精神，即：（一）俄國人的革命精神，和（二）美國人的務實精神。甘地在這兩方面似乎都不够。

印度，在過去，在代表着「印度精神」的甘地領導之下，已經掀起了民族鬥爭的浪潮，今後，她又將如何使這高捲的浪頭不低落而一氣地奔向彼岸，那就得看她是不能够使故有的「印度精神」更擴大，更昂揚起來來決定了。至於甘地個人，倒是不重要的。印度向前進，甘地如能够跟她長久密切聯繫，並養成一種新的先知型的感覺，從而行動上像他過去一樣仍然能够反應着印度羣衆的要求，那麼他仍然將領導着這一個運動的吧！否則，他在今後的人印度，亦將在別的國家一樣觀他爲「過去的人物」，而印度則無論如何將奔向她自己志向底前途！

(三) 尼赫魯

作為一個政治家，比起甘地來，那尼赫魯高明得多了，當我讀尼赫魯回憶時，常常這樣想。

甘地奇特，他平凡，單這一點，我覺得便是使在許多方面勝過甘地的他的長處，甘地被稱為「聖者」，使人覺得不能以衡量普通人的尺度去衡量他；尼赫魯則是明智的行動家，處處比較的更顯露着「人間」。

他常常自己反省，很清楚他自己底弱點，一九三〇年，他領導薩拉哈爾大會，有一段時間無數的羣衆從早到晚流向他來，他正感到興奮與激動，這時有一位女友忽然問他：「是否喜歡這種英雄崇拜，是否對這並不感到驕傲？他說他當時的遲疑立刻「使這位女友覺得這一個私人的問題困惱了我，她表示抱歉」。我開始分析我自己的感情和反應，那非常混亂的，他說「不錯，我在羣衆中間造成了相當的聲望，那幾乎完全是偶然的；我受着知識份子的重視：對於青年男女，我有些像英雄，……關於我的歌曲寫出來了，那最不可能和可笑的故事也產生了，甚至我的反對者也常說着我的好話，承認我並不缺乏才能或忠誠。」「只有聖人或非人的魔鬼，纔能歷這一切而又不爲動，我自認非聖人，也不是魔鬼，這使我覺得驕矜，而給我以信心和力量，但我不會顯著的自大，我對於我的能力有齊公平的估量，我並不妄自尊薄。但我也知道這還有什麼了不得，我十分明白我的缺點，一種自省的習慣，也

許幫助着我保持公正，而能以一種超脫的態度來觀察許多與我有關的事情」。他覺得整潔常常是不合人望的人的奴婢，不一定是道德和智慧的一定標記，他覺得自己作爲一個英雄的名譽完全是假的，他祇承認自己「有着一些肉體上和精神上的勇氣」。

他也非常看重道德，但他贊成積極的而不贊成消極的，爲了自己的緣故而遁世和犧牲，不爲他所喜。「對於那些希望嘗試大事業的人們，不畏艱苦磨折的堅忍能力是重要的。但我却不贊成苦行的生活，消極的生活，以及極端禁欲快樂和感情的生活」，相反，爲了快樂和感情的未來生活，他本身貫徹着「一種積極和建設，行動和鬪爭的精神，所以他在民族革命運動中主張「爲了個人與民族的榮譽，都非對外統治治取更更有攻擊性和戰鬥性的態度不可」。祇要「有機會他就「做些切實的，積極的，建設的工作」。「破壞煽動和不合作都算不得人類正常的活動」，可是當命運擺定「我們只有經過了衝突和破壞的沙溪才能够達到我們建國的境地」時，那麼他覺得就應該把精力與生命全用在鬥爭和喘息中間，一點不容含糊與取巧。因而他痛斥竟謂我們目的不在於一個新國家祇要一個新行政機關，不從事强有力的組織工作而單靠微笑金剛統治者所捨自由自治，他痛斥「太慣於人類的墮落和奴役」，預感粗俗得不會受愛護，會窮，不人道而憤慨，讓暗哨的唐侖和有組織的武裝在精密閉的道德氣

氛中跌落的灰色智識份子，因而他意謂世間最重大的違反道德教條的罪惡是告密賣友，而真的失敗則是「背棄主義，否定我們的權利，和卑鄙屈服於不義」！

他的生活哲學是如此，所以在政治上，他並不同意甘地的非暴力主義。見於非暴力主義後來在印度的表現，他曾給給以嚴厲的批判：「印度最近有一種傾向，只要一種目的或政策被認爲是違反非暴力的，便加以斥責，在我看來，這正是觀察這些問題的正確方法的逆轉，十五年前，我們採取了非暴力政策，因爲牠預曾將用一種最合宜和最有效的方法使我們達到目的，那時候，目的跟非暴力相距還遠，牠並非僅僅是非暴力的附屬物或是結果，當時亦沒有一個能够說目的只能限於自由和獨立，假如這兩項能用非暴力的手段獲得的話。然而現在，我們的目的本身却由於非暴力來加以判定，如果與牠似有未合，便斥拒牠。於是非暴力的觀念，成了一种不可更改的，不能抗拒的教條，因而失去了牠那種訴之於理智的精神，只限在信仰與宗教的神籠裏佔一席之地，牠甚至被人用以維持現狀，成了「既得利益的火爐」，「現在那些曾在不合作以及和平抵抗運動上担負過重的工作，並且竭誠想充實非暴力方法內容的許多重份子，已被認爲異教徒了。……因爲他們不願把非暴力當作教條或宗教，亦不願意放棄他們認爲是唯一值得奮鬥的目標——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他很客氣地說甘

地因為他是超乎一切普通的標準之上的，所以非暴力在他個人手裏今後將怎樣，不得而知，但是許多的實情是可悲的，「許多迫隨着他的，却變成了無益的和平主義者，或是托爾斯泰親的不抵抗主義者，或是不與生活和現實接觸的狹隘的宗派家，這些人們，把許多願意維持現制度的，和為着這目的而利用非暴力的人們，招集在四周」。非暴力的強調，他看非暴力必多少與實生活遠離，牠的流弊必然是（一）或使民變盲目地信教似的接受牠，（二）或完全拒絕牠。（三）牠本身開了缺口，從那裏一切機會主義者爬下牠來！

他與甘地在政治上最根本的距離似乎在於一個是希望「勉力向前」，一個却往往在許多活動上使人想到是希望退到最狹隘的自足政策去，所以尼赫魯常常因甘地而感覺內心的痛苦，一九三四年四月他在亞利波波獄裏，省察過去經歷的時候，他沉痛的記着「我痛苦地感覺到，那個多年來使我與甘地聯結的患難的弦線，現在已經折斷了，在我心內，本來早已有了一種新的角鬥，我對他過去的行爲，一向不甚了解，當和平抵抗正在進行，他的同志正在從事殘酷的鬪爭時，他宣佈絕食，專注於其他的問題；當他出獄，還沒有發誓不願參加政治運動的時候，他那自尋的個人糾紛已使他處於特殊地位；當他與他的許多同僚所從事的工作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那新的忠誠和誓約，已把舊的忠誠舊的誓約和舊的工作擱置一旁，所有這些，全是使我悶抑的。……我已看清，我對於

許多事情的確定和明晰的見解，跟他的見解是相反的。過去，我竭力對我的領袖和同僚忠誠信實，因為我認爲對理想和對同僚忠誠是非常重要的，當我感覺我已漸漸被拉開而遠離了我的信仰的大錨時，我的內心便在搏鬥着！」

尼赫魯的貫徹的精神，從他各種的見解上都表現出來，他堅決地說國民大會的目標是追求一個新國家，而不是一個不同的行政機關。他駁斥那些以「自治領地位」為滿足者，而且堅持非達到「獨立」的目的不可，對於政治上的戰鬥，他則否定對階級或集團的「感化」力量，「假如歷史會顯示一個法則，那就是經濟的利益決定了集團或階級的政治意見，不論是理性或是道德的顧慮，都不能反抗這種利益。個人可以加以感化，他們會拋棄他們的特殊的權利，然而這並不是常見的；但階級和集團卻不會這樣。因此企圖感化一個統治的和特權的階級，使他們捨棄權力和不公平的特權，結果總是失敗，而且似乎亦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牠將來會有成功的可能。」他還引了萊因荷德·奈布爾在「道德的人與不道德的社會」一書中的話指斥那些徹然的「道德家們」說：「他們沒有認清人類集體行爲的那些要素，乃是屬於自然法則的，決不能完全受理性與意識的支配的。他們亦沒有認清：當集體的權力削弱時，不管是以帝國主義的或以階級統治的形式，假如不用武力對抗牠，牠決不會被驅逐的，……因為在社會情況下，理性在某種範圍內，時常是利益的奴隸，因此社會的正義，不是

單靠道德或理性的勸告便能解決的。衝突必不能免，在這衝突中，應該用武力對抗武力」。因此，尼赫魯想懷着以感化，或理性的說服和正義的籲訴來消滅衝突，那是欺騙自己，不運用有效的等於強迫的壓力而希望自已民族從統治的帝國主義國家解放出來，那是一種幻想。這是什麼原因呢？尼赫魯解釋這一點最簡潔明白：「雖然個人有被影響的可能，但一個階級或集團便不同，一個階級因為是一個階級，跟別的階級沒有個人的或親密的關係，即使牠聽到的消息，亦是片面的和歪曲的。無論如何，牠對別階級的挑戰所感到的憤怒，發生了極大的反動，以致把其他各種較弱的感情都加淹沒。因為這階級本身一向慣於自大，認爲牠的優越地位和特權，是社會的良善所必需的，於是任何反對的意見都被認爲異端，而法律秩序和現狀的維持，成爲一種主要的美德，而向現狀挑戰的企圖，則爲最大的罪惡。因此，就反對派而論，所謂感化，並不能發生多大作用」，強迫力量，在竭力減少牠的罪惡的方式下應用牠，時常是需要的。

就政見而論，他是個社會主義者，但是在形式上說他是民族主義者似乎更適當。他承受印度國民大會含糊的資產階級意識，但是牠以前和現在都定印度最進步的組織，而且最有力，而且也盡了革命的任務。因為「民族主義仍將是主要的使命，直到獲得相當的政治，自由為止，這一層是清楚的」。他不同意印度的「少數止統的共產主義者」，就因為「他們敵

觀並痛斥民族運動」。但是對於民族主義發展的方向，他他自己卓越的見地。他認清一個被扯腳的國家，除了努力以恢復民族自由來完成最急切的民族主義運動之外，還應該有其更健康的理想，——那就是社會主義。尼赫魯的傾向社會主義是很自然的吧。(一)身受的不斷的監獄生活(二)親歷的英帝國主義對本國的殘酷統治，(三)崛起的蘇聯新社會對他的印象，(四)他本人與甘地不同的更「明智」更「民主」的氣質。這些都是推進他的動力。尼赫魯在內尼地中寫着他的感想「在監獄裏，人們開始體會馬克思的學說，知道國家真的是一種強迫的工具，是爲了增強那控制政府的一羣人的願望的」。他意謂「世界的大恐慌，似乎證明了馬克思主義分析的正確，其他一切體系和理論都在暗中摸索時，惟有馬克思主義多少滿意地說明它並提供一個真正的解決」。「投我所好的，是因為這主義的毫不武斷和具有科學見地」。他處處說明人民是主角，偉大的歷史力量在他們後面推動他們，在每一次的政治運動中，領袖當然重要，但「沒有一個領袖或煽動家能代替歷史背景以及政治和社會的迫切要求而發動他們行動的」。以世界底大驚慌爲歷史背景時期，他自己也在獄中，不久，他母親妹婿，夫人因參加民族鬥爭都同樣受監獄生活，(一九三三年)他盡量利用那一段時間來研究當時的社會問題，這與他後來不僥倖作爲一個社會主義者而且在許多方面都表示共產主義的傾向恐怕是不無關係的。他說「印度她的各種問題和鬥爭，只成爲這偉大的世界制的一部份，成爲各地在國內和國際方面所進行的政治力和經濟力的鬥爭的一部份。在那鬥爭中

我自己的同情有增無已地向着共產主義方面」。「我久已受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吸引，蘇聯投我所好。蘇聯有些事我不歡喜——對於一切反對意見的無情抑止，大規模的組織工作，實行各種政策時不必要的暴力(我當時以爲如此)。但資本主義世界中並不少暴力與抑止，我愈發明白了：我們食求的社會和財產，我們的根基怎麼就是暴力。不用暴力，它就不能繼續存在許多日子，當數死的恐懼和利溥着各地極大多數人民爲極少數人的光榮和利益去服役後者的意志時，一些的政治自由是沒什麼意義的」。兩個地方都有暴力，但資本主義秩序的暴力是先天的；而蘇聯的暴力，雖不是好事，目的却是要恢復羣衆的和平，合作，真自由而建立新秩序。她已戰勝大困難，向新秩序大步進進，當世界其他地方都被廢除所控制，在若干方面開倒車的時候，蘇聯國內却在我們眼前建立一個偉大的新世界，列寧所領導的蘇聯細細探究將來，只想將來的事，而別的國家却麻不麻過去的死手下，把精力化在保存過去時代無用的渣滓上面，我對於中央亞細亞落後區域，在蘇聯控制下所得大成功的報告，印象特別深刻。所以對照起來，我完全贊成蘇聯」。尼赫魯並且意謂無論蘇聯成敗，因爲布爾雪維克也許會因爲國內或國際的原因犯錯誤甚或失敗的，她仍作爲共產主義國家的實際試驗，却「不影響共產主義理論的健全」。根據這一點，他意謂這個理論可以作爲我們的終極目標，至於怎麼作法，那是另一問題，不過有兩點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一)盲目地照抄

蘇聯發生的事情是可笑的。「因爲牠的應用，要依據各國自己的特殊情形和它歷史的發展階段」。(二)當前的布爾雪維克也許跑得太快，因爲他們四周包圍着敵人，惟恐外來侵略，輾綑一點，也許能避免農村區域所受的許多糾紛。但這樣「就發生這個問題：緩下變革的速率，究竟能否得到真正徹底的結果。在基本構造必須改變的緊要時刻，改良主義是不能解決任何重大問題的」。因此「後來的進展無論怎樣慢，開出的一步必須完全被現行秩序，這秩序已盡了它的作用，現在只是未來進展的累贅而已」。

大致，尼赫魯便是這麼一個人！比起宗教型的甘地來，他幾乎完全兩樣。他厭棄那些叫人「審慎地閉上眼睛，不敢正視現實」的宗教教義，他認爲「宗教對於思想的純潔和宗旨的堅定」，是厲害的敵人——它「說着和平，然而却支持那失去暴力便無法存在的制度組織，它排斥力劍的暴力，然而對於於悄悄而來，和時常波瀾和平的外衣的暴力，對於於摧殘心靈破碎精神的那種暴力，以及臥眠與死亡」，則完全無視！如果「宗教」這兩個字代表着一種崇高的意義，在尼赫魯處爲能引用維維維維維的話：「如果它以專正的赤誠，準備犧牲，不計代價，而無畏地致力於真理的追求，我就稱之爲「宗教的」。在這意義上，人應該以主義的信仰與追求爲宗教！

尼赫魯是平凡的，他底一切見解都不超特，但他確是政治的幹才！